

中國再崛起之後的國際格局會是何種景象呢？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陳欣之

中國再度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世界級強權，已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再度崛起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東亞區域格局的變異，以及全球秩序的面貌，是近年國際關係研究的探索要點之一。針對這些主題的中文與英文論著，可謂是汗牛充棟，各方的研究發現，亦是百家爭鳴。

綜合而言，套用美歐發展之主流國際關係典範的分析架構，是國際關係學者解析中國涉外行為的首要研究路徑。可是美歐國際關係主流典範的現實主義(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視角，均有其內在研究缺失，不能解釋中國掙脫無政府結構束縛的根源因素，對於中國崛起後的世界秩序面貌，以及可能發生的美中霸權更迭問題，也有不同甚至相互歧異的看法。

在中國官方的百年屈辱民族復興敘事之外，回顧過往歷史案例，演繹中國與他者的互動模式，剖析中國主宰下的國際格局內涵與特徵，構成另一個理解中國主宰下全球秩序可能構成的知識窗口。這些學術努力，以過往華夏中國歷史實踐為樣本，例如天下體系、東亞層級體系的意涵，以及朝貢體系的時代意義，試圖突顯現行國際理論典範的適用侷限，質疑且反思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發展有別於現行既有定見的分析典範，作為詮釋中國對外行為基礎，解釋與預測中國與東亞國家互動關係，補充現行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深度與廣度。

如果由東亞看天下，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政經格局，具有何種特性呢？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走出衝擊一回應模式的西方中心論偏見，提出另一幅東亞國家的認知圖像。濱下武志揭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具備獨特主體制度暨運作規律的亞洲經濟圈。外在衝擊固然解體中國的舊制度，但中國亦調適且萌生新的制度。繼承朝貢體系的過往，東亞經濟圈在今日的全球經貿網絡，仍佔據相應的重要位置，彰顯歷史的延續性。



美籍韓裔學者康燦雄(David C. Kang)，剖析朝貢體系的國際政治特性，直陳中國為核心之東亞朝貢體系的和平與穩定。他在《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一書中主張，美歐國家構建之主權國家間形式平等的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反映參與國家間的常態性權力競爭與爭戰殺戮。相對地，自1368年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的明清中華帝國時期，則是相對和平與穩定。中國是當時朝貢體系內無可爭議的區域霸主，其他國家亦長期接受從屬於中國的次等國際地位，但被中國賦予極大的自主權。霸主-從屬國相互認同且接受所構成之層級式(hieratical)朝貢體系，涵蓋了軍事、文化與經濟等多個層面。佐證當時明清帝國與朝鮮、越南暨日本，只發生兩次大規模衝突，康燦雄主張朝貢體系具有長期和平穩定的特徵。康燦雄對朝貢體系的描述，顯然刻意忽略明清帝國在同一時期與蒙古暨中亞等國的征戰衝突。不過他的研究發現，的確讓吾人正視東亞國際秩序的歷史特徵。康燦雄挑戰中國會複製西發里亞體系秩序的定見，重塑吾人對東亞國際互動的理解，也提出了中國主宰國際秩序的另類可能模式。

中國過往組建國際秩序的實踐，佐證中國主體的世界觀想像，顯然是與美歐視角存在極大歧異。不過，驅動中國構建國際秩序的自我世界觀，又是什麼呢？日本東北大學助理教授羅斯(Antoine Roth)撰寫的《A Hierarchical Vision of Order: Understand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sia》，追溯中國秩序觀的天下觀根源，探討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論證過往中華帝國時代的國際政治實踐，仍反映體現在當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羅斯認為中國的傳統天下觀，旨在創建一個層級式國際秩序。此種自我期許，反映中國菁英維護國際秩序的自我責任感，

認定層級制度才是養成秩序的唯一路徑，進而合理化中華霸主與從屬他者的不對等位階，更以中華文明的相對道德優越性，論證中國的主宰地位正當性，進而鋪陳出一套強加於從屬小國的「是非」行為準則，維護中國主宰的國際層級秩序。中國更運用話語宰制，武力優勢威嚇與施惠從屬國等三種政策工具，深化從屬國對於中國主宰天下秩序的順服強度。中華天下觀建構的層級秩序結構，似與國際關係主流典範的國家稱霸驅動有相得異彰之妙。國際關係主流典範，強調國際無政府結構驅動的權力競爭本質，但是中國天下觀反映創建穩定秩序的自我期許，則是彰顯中國傳統文化加值的中華自我能动性。此種結構驅動與自我期許互濟相乘的知識發現，分別解析了中國再崛起的可能原因，也為未來全球秩序的可能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多樣性可能。

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試圖從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歷史實踐出發，萃取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典範，反映中華歷史文化的話語，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之國際關係理論，或是國際關係理論之「中國學派」。可是中國學者的努力，在過度強調中華獨特性與中國例外論的情況下，不時被質疑淪為中國對外政策的背書工具。中國學者亦有批判創建中國學派的走向，不能淪為孤芳自賞，而是需要得到國際研究社群的認可，具備解析中國以外之國家或是區域互動的理論普適效度。

在這一波各述己見，描繪中國再崛起的知識盛宴中，台灣學術社群亦沒有缺席。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認為，從國際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的中國，究竟會採取怎樣的對外政策，對於與中國僅僅只有一海之隔而且兩岸在政治關係上糾結錯綜的臺灣而言，乃是至關重要且涉及存亡的重要議題。從2015年起，吳玉山院士結合台灣國際關係學者與歷史學



者，針對中國再崛起課題，接續舉行研討會匯集各方研究發現，並已有豐碩成果。十年來，台灣在地學者在吳玉山院士主持下，先後出版《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以及《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二本專書，更在《政治科學論叢》、《問題與研究》、《政治學報》、《台灣政治學刊》與《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等一流TSSCI學術期刊上，不時發表發人深省的學術卓見，代表台灣學者對於攸關台灣命運發展存續課題的知識回應。

台灣學子在應對中國再度崛起的課題上，看似具有相對比較學術研究優勢。臺灣學術社群對於中國文化、歷史與政治思想，曾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再者，台灣學者長期受美歐學術思潮浸淫，掌握美歐國家發展的主流研究方法。就學理研究與實務挑戰而言，臺灣的學術界，應該是最有能力回應中國崛起後全球秩序變動的迫切挑戰。但是不容諱言，

台灣學子在掌握中國背景知識的基本功夫，仍有再夯實的必要，更有熟悉中國的內涵變化與歷史構成多樣性的必要。如果台灣學子可以閱讀繁體中文，卻無法理解諸如《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中華政治經典的精髓神妙；可以對美歐主流國關理論的英文術語朗朗上口，卻對中國歷史發展模糊一知半解，未能採集中國的歷史案例實踐作為研究樣本；或是為圖便利直接復刻中國官方論述，未能洞悉中國論述的理論缺陷，都會限制台灣學子理解中國再崛起課題的研究品質。

補充現有美式主流國際關係典範的不足，解析中國對外關係的台灣在地實務需求，是吾人深入剖析中國再崛起後國際格局面貌的最大動力。但是如何做好做實此一課題，還需要台灣在地學子的自我高標準期許，練好基本功，方能拿到入場中國研究學術堂奧的門票。

延伸閱讀

- Roth, Antoine. 2023. *A Hierarchical Vision of Order: Understand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sia*, 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Ban. 2017.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Tianxia,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甘懷真，2024，《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台北：三民書局。
- 吳玉山，2018，《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 吳玉山與張登及編，2023，《大國逐霸·小國圖存：東亞歷史與國關理論》，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 康燦雄(David C. Kang)著，陳昌煦譯，2016，《西方之前的東亞: 朝貢貿易五百年》，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Kang, David.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許田波，2018，《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Hui, Victoria Tin-Bor . 2010,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蔡東杰，2024，《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台北：暖暖書屋。
- 閻學通、徐進，2009，《王霸天下思想及啟迪》，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濱下武志著; 朱蔭與歐陽菲譯，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